

近代西方基督教会与齐鲁大学

彭益军

首先应当指出,本文所言基督教并不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,而是单指新教,或曰耶稣教,即西方人所说的抗议宗或抗罗宗(Protestantism)。天主教与东正教分别于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末传入中国,基督教则是在 19 世纪初正式开始在华传播的。

18 世纪末、19 世纪初,正值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的振兴时期,英、美等国于此时纷纷成立了对国外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机构。1807 年,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抵达广州,成为近代踏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。嗣后,英、美、德等国教会又陆续派遣了部分传教士来华。由于清廷执行着闭关禁教政策,这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,只能局促于东南沿海的广州、澳门等地,且处于一种比较秘密的状态。虽然如此,传教士们仍相信:“终有一天,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,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。”秉持这样的信念,他们一方面向西方国家吁请以强硬政策叩开中国大门,一方面又运用办教育、兴医疗、编译宗教书刊等手段,为日后大规模地在华传教作准备活动。就办教育而言,马礼逊于 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一所“英华书院”,目的是“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中文”。马礼逊死后,广州、香港等地的一些传教士和商人于 1835 年组织了一个“马礼逊教育会”。其宗旨是将来“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,……并通过这个媒介,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。这些学校要读《圣经》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”,希望“看到中国人……在抛弃了他们的反感、迷信和偶像之后,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在一起,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”。1839 年,美国传教士布朗又在澳门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——“马礼逊学堂”。如传教士们所愿,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使腐败的清王朝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,并废除了实行了一百多年的“教禁”,允许外国人在五个通商口岸地区公开传教。于是,西方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,而辅助传教的教会学校也在

校园的文化导向,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。学校要主动与学生家长密切配合,互为补充,形成合力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又是一个教育单位。事实证明家庭教育的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。因此要加强家庭教育的研究,加强对家长的培训提高,真正收到抓一代促两代的效果,不断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。社会环境和氛围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影响的作用不能低估。要强化社会教育功能,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。全社会各级组织、各个行业、各个单位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,承担各自的责任,引导青少年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,健康的审美情趣,正确的消费方式,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在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中要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,要注重发现和培养青少年身边的可敬、可信、可尊、可学的先进典型,在青少年中形成崇尚先进、学习先进、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。对青少年要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,使他们做到学法、知法、懂法、守法,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。要抓好社会综合治理,对有违法犯罪倾向的青少年要加强引导和教育,对解除劳教的要做好帮教工作,巩固教育改造的成果。

(责任编辑:李春明)

逐渐增加。1860年之前,包括基督教传教士在内,西方传教士在五口商埠和香港约开办了50所洋学堂,学生约有1000人。这些学校规模不大,程度皆属小学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,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,与西方侵略者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、《北京条约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加速了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半殖民地化。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,西方教会获得了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,教会学校随之从沿海向内地迅速地扩张起来。到1875年左右,教会学校总数增至约八百所,学生约为两万人,其中,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所,学生约六千人。这时的教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,但出现了少量中学,约占学校总数的7%。齐鲁大学的源头——文会馆,便是在此时完成由小学向中学的过渡的。

文会馆由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立于登州(今蓬莱)。登州与烟台是《天津条约》签订后西方列强在山东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,也是英、美各基督教差会传教山东的桥头堡。对于在山东传教布道,传教士们都十分重视。他们认为:“在过去的时代里,中国的宗教与政治都是由山东产生。在将来的年月里,它要把基督教贡献给中国”。传教士们还认识到,用倡明文化学术、兴办教育的方法帮助自己打开传教局面,“对于孔子的故乡山东,真是再合适不过了”。基于这种认识,19世纪60年代山东出现了第一批基督教会学校。1864年狄考文在登州开设了一所“蒙养学堂”。狄氏蒙养学堂本是教会小学,1873年起设置中学课程,1876年正式改名为“文会馆”。文会馆首重宗教教育,但也传授一些儒家典籍和西方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方面的知识。

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,在山东乃至全国的基督教教育网络中,中小学数目有明显增长,大学也开始出现(同期,天主教的办学重点仍为小学与神学)。狄考文属于教会大学的积极倡办者。他断言:“不论哪个社会,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。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。对传教士来说,全面地教育一个人,使他能在一生中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,这样做,可以胜过培养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人。”1882年,经狄考文提请,美国国内差会纽约总部批准文会馆重新安排课程,提供六年制高等教育(相当于读完美国的预备学校和大学的头两年),文会馆的英文名称定为“登州学院”(Teng Chow College)。可以说,尽管达到大学程度的文会馆条件比较简陋,但它确是近代山东的第一所大学,亦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。19世纪90年代,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开办的“广德书院”也出现了大学班。

20世纪初,在全国范围内的基督教教会合一运动的影响下,山东境内的各不同教派加强了教务合作。1902年,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在青州开会,通过了合办“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”的决议。这所大学分为文理科、神科和医科。文理科由文会馆和广德书院大学班于1904年联合组成,集中到潍县开课,称为“广文学堂”;神科由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“郭罗培真书院”和美国北长老会设在烟台的“教士馆”于1905年合并而成,定在青州开课,称作“青州神道学堂”。在医科建设方面,分处济南、青州、邹平、沂州(今临沂)四地的四所教会医学堂合并为“共合医道学堂”,算作大学的医科。共合医道学堂起初并无固定校址,其四个年级的学生于1906年集合到了济南,而后按时巡回回到济南、青州、邹平、沂州的教会医院上课实习。

自1904年之后,广文学堂和共合医道学堂又陆续得到英、美及加拿大多个差会的支持,得以增建校舍、充实设备、加强师资,教育水平有较大的提高。1911年,共合医道学堂在济南拥有了固定的校址和教学医院。不过,一所大学三科异地而立总不是长久之策,向省城济南过渡集中则逐步成为传教士们的共识。1917年,经过各差会多方努力,广文学堂和青州神道学堂迁入济南,与共合医道学堂一起,加上英国浸礼会设于济南的“广智院”,正式组建了“齐鲁大学”。参与齐鲁大学建设的差会共有14个。齐鲁大学的管理总部(亦称托事部)由这些差会联合组成,设于加拿大的多伦多。齐鲁大学董事会则根据管理总部的指示,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。学校的宗旨为“依基督教主义教育中国青年,俾皆被基督教之泽”。

1924年,齐鲁大学经加拿大议会和政府认准立案,获得授予国外学位及名誉学位的权利。为了争取中国政府的承认,齐鲁大学又于1925年和1930年先后向北洋政府、南京国民政府申请立案,并着手实施了一番改革,如增大校董事会中中国人的比重,聘请中国人朱经农为校长,聘请孔祥熙为董事长;将

文理科改为文学院和理学院,医科改为医学院,神科改称“齐鲁神学院”继而脱离齐鲁大学;宗教课定为选修……。1931年12月,齐鲁大学终被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。立案之后,齐鲁大学虽然在名义上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控制,但其管理实权仍掌握在教会手里,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依然常见。

抗日战争爆发前的30年代里,齐鲁大学处于全盛时期,拥有文、理、医三个学院。文学院有国学、英文、教育、历史政治、社会经济等系,附设国学研究所。理学院包括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天文算学等系。相比较而言,医学院源头最近,却是三个学院中的重点,发展最快。医学院是七年制。头两年为预科,由理学院授课,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升入本科,学习基础医学课。五、六年级开设临床医学课,第七年学生到医院进行临床实习。医学院还先后设立了公共卫生系、护士专修科和药学专修科,并设医学编译部(隶属中国博医会出版委员会)。医学院附属医院——齐鲁医院以科室齐全、设备先进著称,处于省内医疗技术中心的地位。到抗战前夕,齐鲁大学已是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教会大学。它的学生来自国内多个省市、各个阶层,毕业后在社会上多享有良好口碑。齐鲁大学医学院更是名闻遐迩,有“南湘雅,北齐鲁”之誉。^⑪

抗日战争期间,齐鲁大学迁往四川成都,陆续增置了化验技士专修科、药学系、寄生虫研究所等系所。抗战胜利后,齐鲁大学迁回济南。济南解放前夕,齐鲁大学部分师生再次南迁,先后落脚于杭州、福州,及至全国解放,才又搬回了济南。1952年,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,齐鲁大学被撤销,其原有各个学院分别并入专业相同的专门学院。原齐鲁大学校园则成为经过重组的山东医学院(由原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原山东医学院组成)的校址。

对于教会教育事业,过去和现在的人们有过多种评价。我们不能忽视的是,教会教育机构在近代中国荡漾开去,是在中国逐步乃至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中完成的。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中,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始终未曾停止对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的侵略与渗透。诸多教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,正折射出了这种侵略、渗透活动。齐鲁大学由登州源起直至最终定型于济南,便是应和了西方列强侵略山东不断深入的势头。各教会学校尊崇的宗教宣传,以及闪现其间的一些民族虚无观、西方种族优越意识等,无疑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潮流相悖而行,只能有利于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巩固。据此,人们早已得出结论:齐鲁大学并非一所“理想学府”,而是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”。^⑫

但是,教会的教育机构绝非一无是处。就齐鲁大学来说,它不仅为近代山东的新式高等教育提供了清晰的参照,而且较为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、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,向社会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专门人才。仅齐鲁大学医学院就先后培养了1000余名医护人员——包括一批医学名家在内,为山东及其他地区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。^⑬无疑,齐鲁大学同别的教会学校一样,皆以传播宗教为原始目的,但“历史假手教会学校,以动机与效果相悖的特殊形态,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,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”。^⑭对此,我们是不应该回避的。毕竟,真实的历史画面,总是汇聚了明暗不同的多种色调。

注:

顾长声:《传教士与近代中国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,第28、40、226、227页。

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山东省志资料》1962年第4期,第2页。

^{⑪⑬}陶飞亚、刘天路:《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,第160、217、225页。

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,1890年》第459页。转引自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》下册,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,第15页。

^⑩王神荫:《“七七”事变以前的齐鲁大学》,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文史资料选辑》1982年第1辑。

舒新城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下册,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,第1102页。

^⑫田牧:《帝国主义为什么办齐鲁大学》,《大众日报》1952年7月26日第3版。

^⑭李华兴:《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化》,《江海学刊》1997年第3期。

(责任编辑:刘运兴)